

《经济参考》丛书

大趋势 改变我们生活 的十个新趋向

〔美〕 约翰·奈斯比特著

大趋势

改变我们生活的十个新趋向

○

〔美〕约翰·奈斯比特著

○

孙道章、路林沙、王金余

○

刘蘅芳、方乐频校

新华出版社

大 趋 势

——改变我们生活的十个新趋向

〔美〕约翰·奈斯比特著

孙道章 路林沙 译

王金余 赵英琪 译

刘蘅芳 方乐颜 校

*
新华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新华社印刷厂排版

京安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1印张 插页2张 21,000字

1984年6月第一版 1984年6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1—200,000册

统一书号：4203·017 定价：0.95元

《大趋势》带来了什么信息？

——译者前言

正当我国人民振奋精神迎接世界新技术革命的挑战、加速社会主义建设之际，我们谨向我国经济工作者、科技工作者和广大读者推荐这本《大趋势——改变我们生活的十个新趋向》。

这是1983年美国最畅销书之一，在美国的经济界和知识界引起了比较大的反响。作者约翰·奈斯比特是美国《趋势报告》季刊的发行人，奈比斯特研究与咨询集团主席。在约翰逊任总统期间曾在白宫任职，现在还担任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和国际商用机器公司的顾问。

(一)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曾说过：“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大趋势》这本书对我们有什么参考价值呢？它给我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

们带来了什么信息？

一、关于信息社会问题。书中说：“虽然我们还是认为我们生活在工业社会，但事实上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以创造和分配信息为基础的经济社会。”这是一种“最微妙”和“最具有爆炸性”的转变。

作者认为，美国的信息社会开始于1956年和1957年。其标志是：担任技术、管理和事务工作的白领工人人数已超过了直接从事生产的蓝领工人，以及苏联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美国在1950年时约有百分之十七的人从事信息工作，现在则有百分之六十以上的人同信息打交道。

在信息社会，战略资源是信息。“我们已经使知识的生产系统化和增强我们的脑力。以工业作个比喻，我们现在大量生产知识，而这种知识就是我们经济的推动力。”作者还援引彼得·德鲁克的话说：“知识生产力已经成为生产力、竞争力和经济成就的关键。知识已经成为首要产业，这种产业为经济提供必要的和重要的生产资源。”

电子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使人类更快地进入信息社会。到八十年代末，电子工业可能成为地球上最大的产业部门。目前电子计算机已渗入“整个世界的工作”，“历史上没有一种技术在工作场所有过这样大的应用范围”。到1985年，美国全部工作的百分之七十五多少会涉及电子计算机——而不知道怎样去应用电子计算机的人会处于不利地位。

作者认为，在高级技术的信息世界中，人们是利用脑力、而不是象工业时代工厂的工人那样从事体力劳动。因

此，最艰巨的挑战还在于人的训练。如果不具有基本技术，就必然是“计算机文盲”，掌握电子计算机知识，已成为“当代教育必不可少的一项成果。”在信息社会中，美国人必须掌握两种语言：英语和计算机语言。美国各地的中学已纷纷开设计算机课程；哈佛大学要求毕业生都有编写一份简单程序的能力；企业界人士学习计算机知识也蔚然成风。

当然，从工业社会过渡到信息社会，并不意味着制造业不存在或者变得不重要了。工业时代到来，农业结束了吗？美国在农业时代，百分之九十的人生产百分之百的食物；现在只有百分之三的人生产百分之一百二十的食物（美国谷物有百分之二十供出口）。问题是，在信息时代，“制造业注意力的集中点会从体力功能转向体力所依赖的智力功能。”“而技术的发展，又增加了我们的智力。”

作者把美国经济分成“朝阳经济”和“夕阳经济”两类。微电子、生物工程等新兴的知识密集的工业，犹如朝阳东升，迅猛发展；而传统的钢铁、汽车、纺织等工业却如夕阳西下，不断衰退。在第九章中，还列举了“十个机会大好的城市”，诸如阿尔伯克基、奥斯汀、圣何塞（硅谷）等。这些都是属于信息工业和其它高级技术工业急剧发展的地区，是“技术专家们乘未来之浪潮前进的地方”。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而且正在成为越来越重要的生产力。本书有关信息社会（尽管这种说法我们认为并不很确切）的论述，对于我们加强科学技术工作、更加重视智力开发，进一步贯彻“经济建设要依靠科学技术，

科学技术要面向经济建设”方针，也许是有所启示的。

二、关于各国经济的相互依存问题。书中指出当前的一大趋势是从过去各国的一国经济走向世界经济，正在形成“全球的相互依赖”的经济格局。

第三世界的兴起是当前世界上的瞩目事件。作者承认：“当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缓慢，并不断发生周期性危机时，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却进入惊人的繁荣期。”使许多工业家沮丧的是，第三世界在其新的工业中表现得十分胜任，使他们不得不在“事实面前认输。”

在这个世界里，发达国家必须与第三世界进行交往。过去发达国家并不真正懂得在与第三世界交往中应该起什么作用，“既无策略，又无远见”。过去只是由于道义上的原因时，发达国家才考虑对穷国的援助，现在这一点依然如此，但是还有一个“可能是更有力的理由，那是为了北方（发达国家）自身的利益”。作者直言不讳地说：“在相互依存的世界中，援助不是施舍，而是投资，它尤其是一种战略性投资。”

作者认为，各国合作生产已成为新的全球模式，或者说，成为世界经济一体化中的普遍方式。书中除了以汽车工业的全球化为例以外，还列举了几个具体例子：

- 棒球手套的生产。这种手套的原料——牛皮是美国出产的，但是是在巴西鞣制加工的，全世界有百分之九十五的手套是在日本生产的，然后再大量销售到美国。

- 日本的电子计算器。它的心脏即微处理芯片是从美国进口的，外壳是印度制造的，计算器的装配却在新加坡、印尼和尼日利亚，然后运到日本的神户或横滨加上“日本制造”的牌子，再运销世界各地。
- 过去美国向外国投资，现在美国也在积极争取外国资本。有四十个州为争取西德大众汽车公司投资两亿五千万美元的工厂设在本州而互相竞争。

这些都表明：一个国家可以关起门来发展经济，或者左右世界经济的“昨天已经结束了”。

书中还说，在尖锐的国际竞争中，“中国最近成为制造业中新出现的竞争对手，这使竞争进一步激化。”在这段话中，读者可以看到中华的崛起对世界经济的全局已开始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有本质的区别，但是处在从国家经济走向世界经济这一趋势中，也可以加深我们对进一步“对外坚持开放”这一方针的正确性的理解，从而更主动、自觉地利用这一趋势。

三、关于分散化和多样化的趋势。作者认为美国这个国家太复杂多样，因而联邦政府搞不了集权政策。那种“头重脚轻”的集权机构正在消亡，美国早期出现过的“政府管得越少越好”的主张，现在又行时起来了。

这种分散的趋势无论在联邦政府与州政府、州政府与地方政府、城市与乡村、以及大企业与小企业各个领域内都反映出来，而在社会生活中，则表现为“进入了一个多样化的社会”。

在1981—82年的美国第九十七届国会中，提出了大约一万五千件提案，而获得通过的只有五百件（占三分之一）；但是在同时期内，各州的议会提出了三十五万件提案，其中有五万件（占七分之一）已成为法律。这不但反映了国会越来越陈腐，州议会的效率却要高得多了；而且还反映了“在决策过程中，要求有更多的、自下而上的参预”，州政府要求有更大的权力，从而导致美国很多政治程序的改变。

随着权力分散到州里，州政府又进一步受到地方政府机构的挑战，那些“地方上的革新者”已提出了“只要州（或联邦政府）的资助，不要州的控制”。

城市人口的大量减少，小城镇的兴旺发达，这又是一种全国性的“非同寻常的趋势”。七十年代，小城镇和农业地区的人口增长速度比大城市高百分之十五点五。现在美国有九千五百万人，即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四十二住在农业地区和小城镇。但是小城镇的兴起并不是朝农业发展，“正是企业本身分散化的发展，造成了小城镇的兴旺，企业把新的设备、厂房安置在远离城市的空间和开阔的地方”。

随着智力在生产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智力密集型企业的兴起，形成了美国新建的小企业大量增加。1950年，美国新建企业九万三千家，而现在每年有六十万家小企业开张。这些小企业从1970—76年的七年中，共安排了六百万人就业，还有三百万人在州和地方政府就业，而在联邦政府和美国一千家最大工业公司就业的人数却没有增加。

作者认为，随着分权的发展，即使不会带来分崩离析，至少也会增加一些荒唐的事。但是这种分散的趋势看来是无可逆转的了。

我国经济正在探索改革的道路，这种改革当然不能单纯看作是权力和利益的分散。但是从农村扩大生产队自主权（进一步发展为多种形式的责任制）；在城市扩大企业的自主权都已取得了重大的成果。在正确处理集中和分散、企业的责权利、探讨小城镇的作用等问题上，我们从书中的一些论述中，也许可以得到某种参考的信息。

四、关于确定长期战略问题。在一个不断变化的世界中，我们必须有长期的战略。这是本书作者提出的又一个重要的趋势。他说：“长期计划已成为许多企业、特别是在产品行销全球的公司的热门课题。”

作者指出，过去，美国企业管理人员都为近期利益而工作，不仅忽视了长期利益，而且常常是以长期利益为牺牲品。日本管理人员正相反，他们不顾短期成本，只追求长期的战略，这恰恰是日本成功的奥秘之一。

在美国经济史上，公司因为没有随着世界的变化而变化，终于成为“企业坟地中墓碑”的例子，比比皆是。大公司如果不能在变化的市场和技术上保持优势，它们就不可能不被别的公司超过，而成为落伍行业。美国多数人也已经了解，我们为了短期便利污染了空气和水，而使我们生活和环境却长期受到损害，实在得不偿失。光砍树而不种树，我们的子孙后代将无可用之材了。

因而一个管理者决不能只重视短期成果，和以量的标准来衡量经营状况，以致忽视了提高国家创造财富的能力所必需的投资和革新。必须大力改变近视眼的处事标准，重申进行基本研究、承担风险的长期计划。要“一手抓短期利润，一手抓长期发展”。

过去也有一些企业搞长期战略计划，但大部分是赶浪头的，一旦计划制定，也就束之高阁。所以战略计划如果不首先有一个战略设想，那就毫无价值。

作者说，在批评声中，美国也出现了转变迹象，从短期观点转变为长期、或者是比较长期的观点。

美国企业开始重视长期战略的动向，对我国的企业、甚至一个行业和地区，不也是一个重要的信息吗？

(二)

如果说，本书所列举的十个趋势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美国经济的动向的话，那么，作者在书中却回避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大趋势：那就是美国经济处在急剧衰落之中，国内矛盾重重，危机丛生。作者也不得不流露出“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慨叹，写道：“问题的关键是美国近年来的衰落确是事实。”

作者说，美国人一贯乐于在世界经济中充当主要角色，但是这是过去的情况了，现在美国不能再主宰世界经济了，“要重新获得工业霸权已经太迟了。”1960年以来，美国在世界出口总额中的比重已从百分之十六下降到百分之十一。

1979年，美国公司生产的产品在国内市场所占的份额：汽车降到百分之七十九，钢铁降到百分之八十六，消费电子产品不到百分之五十，而在1960年时，却都占有百分之九十五！一度作为世界经济主角的美国，“已经过了全盛时期”，而且产生了大量的经济恶果：失业、生产率下降、高利率、进口增加、投资萎缩、经济明显地停滞不前……。

在北部那些老工业区，已是一片式微和衰败，“工厂一个接一个地关门”。费城在七十年代一共减少了十四万就业机会，居民少了十六万人。布法罗、克利夫兰和圣路易斯，这些历来是工业化北部城市的表率，在七十年代人口少了近四分之一；东北部被遗弃城市在基础结构方面遇到灾难似乎没完没了。

在美国国内的政治、社会生活中，矛盾也在激化。作者毫不掩饰地说：“事实上，再也没有人相信政府有所作为”，人们深信政府再也不能保护他们了，我们越来越感到失望。我们问道：“信赖什么？信赖谁？”响亮的回答是：“我们自己。”

政客的影响越来越小，国会已是一个陈腐机构，两党制本身像个空壳子。对美国政党忠心耿耿的年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用不久，谁宣称自己是民主党或共和党的忠实信徒，谁就会认为目光短浅和孤陋寡闻。作者援引一位国会议员的话说：“我们有领导人，就是没有追随者。”1980年总统选举时，只有百分之五十三的合格选民参加投票，即有百分之四十七选民拒绝参加。选民甚至颇为幽默地讽刺说：

“在危机中，我们选举林肯和罗斯福当总统，而在平时，我们只选庸碌之辈。”

作者叹息道：今天的问题——经济衰退、政局动荡、棘手的社会问题成堆，“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好象聚集在倒塌的金字塔废墟上讨论该怎么办？”

(三)

作者认为，我们正处在一个交替时期，这是一个“变化和探索的时期”，当许多人处在“畏惧未知的将来，墨守已知的过去”的时候，作者对美国经济和社会的趋势进行大胆的探索，对我们是有一定参考价值的。本书取材也比较严谨。为了帮助读者作进一步的研究，我们把作者的原注（即所采用材料的出处）全部译出，附在正文的下面。

当然我们也必须指出，作者从资产阶级立场和世界观出发，他回避美国社会内劳动与资本的对立，否认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社会性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这一基本矛盾，掩饰超级大国对第三世界的掠夺和剥削。因此，从根本上说，是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相违背的。特别其中有个别段落直接攻击马克思主义，诸如作者认为在信息社会里，不是劳动创造价值，而是知识创造价值。对于这些错误观点，我们在翻译过程中，有的加上了译者注；有的相信广大读者也是能分辨的，也就没有一一加以说明。对于我国读者接触比较少的专门名词和人物，在翻译过程中也加了注释，以便读者阅读。

参加本书翻译的有孙道章（绪论、第一、二章）、路林沙（第三、四、五章）、王金余（第六、七、八章）、赵英琪（第九、十章、结论）。校对为刘衡芳（第五章以前）、方乐颜（第六章以后）。责任编辑和前言的执笔者为陆亨俊。

我们在编译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希望能得到广大读者的指正。

目 录

(1)	绪 论
(13)	第一章 从工业社会到信息社会
(53)	第二章 从强迫性的技术到高技术和深厚感情
(73)	第三章 从国家经济到世界经济
(104)	第四章 从短期到长期
(128)	第五章 从集中到分散
(171)	第六章 从机构帮助到自助
(209)	第七章 从代议制民主到参与制民主
(251)	第八章 从等级制结构到网络结构
(274)	第九章 从北到南
(309)	第十章 从非此即彼到多种选择
(333)	结 论

绪 论

我们这个社会已经在从旧的往新的变动，现在还没有变完。夹在新旧交替时代之间，我们的环境是很不安宁的。然而，在这个有时令人感到痛苦、不稳定的时刻，美国正无情地进行结构调整的工作。

这本书要谈的是尚未完全成形的美国新社会。虽然如此，美国的结构调整已经改变了我们的内部和外部生活。本书分十章，每章探讨下列这些重要结构重组中的一个方面：

(一) 虽然我们还是认为我们生活在工业社会，但是事实上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以创造和分配信息为基础的经济。(二) 我们正走上高技术和深厚感情①的双重方向，每种新技术都要付出人的补偿性的反应。(三) 我们不能再搞孤立、自足的国民经济体系了；现在我们必须承认我们是全球经济的一部分。我们已经开始放弃美国是、而且必须继续是世界工业领袖的这种想法，因为我们要去干别的工作。(四) 我们要从一个短期考虑和短期报酬的社会转变成为在以长期的眼光

处理问题的社会。（五）在一些城市和州、在小团体和地方组织中，我们还发现，自下而上都有进行创造性工作和取得成果的能力。（六）我们生活的各方面从依靠组织机构的帮助转为更多的依靠自己。（七）我们发现，在一个瞬间可以共享信息的时代，代议制民主制度已经过时了。（八）我们不再依赖等级制结构，而赞成非正式的网络。这对实业界将特别重要。（九）更多的美国人离开北部老工业城市，到美国南部和西部去生活。（十）我们从一个狭小的个人选择范围的社会，跨入一个能提供多种选择的社会。

这些大模式不一定很清晰。在新闻媒介，特别是电视里，我们好象生活在由一系列事件组成的社会里，一个事件接着一个事件发生，有时甚至一次危机接着一次危机，而

-
- ① “高技术和深厚感情” (*High Tech/high touch*)：这种提法见本书第二章和其他一些章节。它是指物质和精神之间需要平衡。在信息社会，自动化程度高，电子计算机和机器人等设备日益广泛的应用，人的体力劳动会减少到很低程度，人的部分脑力劳动也为电子计算机所取代，这样一来，人们为了要适应这种环境，一方面会对新的技术增添感情，因新技术的应用的确减轻劳动和缩短了劳动时间，引起人们的好感和兴趣；但另一方面人们感到依然需要用脑用脑，去干些别的事，以平衡单干一种用脑过多的工作，甚至为了避免在机器面前工作过于单调，需要象以前许多人在一起工作那样，大家再到一起活动，如一起聊天、一起看电影、亲自上街购物和到自然界游玩休息等等。作者使用“深厚感情” (*high touch*) 一词含义很广泛，读者在阅读到本书下面一些章节时，将会有新的体会，理解这个词的意思。——译者注